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 (美) 马克·戈特迪纳著;
任晖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4

(城市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499 - 6348 - 5

I. ①城… II. ①马…②任… III. ①城市社会学—
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5357 号

- 书 名 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著 者 [美] 马克·戈特迪纳
译 者 任 晖
责任编辑 李明非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电话 025-5757250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 21152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99 - 6348 - 5
定 价 45.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公 众 号 苏教服务(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城市研究系列

Urban Studies

城市研究系列

主 编 周 宪 [加] 罗伯·希尔兹
项目总监 任 晖

出版说明

城市研究领域很深广,涉及多学科内容。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规划、可持续发展等主题,都与城市有关。这些主题大致涵盖了实体的物质空间和抽象的文化空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生活有关的问题大多是城市问题。

“城市研究系列”即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在理论上的一种回应。“系列”以经典性与前沿性为导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在内容方面重点关注与城市主题有关的经典性著作、各学术流派的代表作、当代前沿问题研究、城市研究新理论、城市文化现象与发展方向的探讨等。这些内容不仅追溯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诸多富有影响力的节点,也契合了当前社会的热点和趋势。

“城市研究系列”既重视国外先进的城市研究著作的引入,也重视国内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优秀的原创著作的出版。我国的城市研究起步较晚,引入国外先进的学术理论,其目的是丰富我们认识城市的路径,建立更加科学的观照体系,从而形成并完善我们本土的城市理论系统建构。

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击者、参与者、解释者、引领者,我们有

责任告诉世界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这一巨大的城市化转型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呈现,去引领。

我们期待“城市研究系列”这一高水准的中外城市理论研究出版平台所带来的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能为我国新型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序

20 世纪 70 年代,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我接受了社会生态学方面的训练,因为这是当时美国大学唯一教授的城市社会学范例。我发现这一独特的方法在解释大都会区域发展这一新兴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对大型的、主要的城市的影响时,能力十分有限。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1977 年出版),我对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著作已经非常熟悉,在去巴黎之前的那些年,我花了一些时间开始把列斐伏尔的观点应用于城市现状,因为这是一种可替代性选择方法,尽管在当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那时我的案例研究已经出版了,对美国读者来说,已经可以利用来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系列著作,这些研究改变了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思考大都会发展的方式。在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派——包括让·卢日金内(Jean Lojkine)和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争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种形式的努力激发了很多国家的城市社会学家——被称为“新城市社会学”——作为一种范例,它大范围地取代了社会生态学,成为关

于城市现状方面的通识 (Gottdiener and Feagin, 1988; Gottdiener, 1994)。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里弗赛得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始了一份新工作,发现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继续从事这一拓展性项目,尽管新城市社会学有其先进性,但它在理论上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对于列斐伏尔富有远见卓识的《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应用不足。事实上,两位最受欢迎的新城市主义者——卡斯特尔和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没有利用列斐伏尔运思缜密的著作也确立了他们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列斐伏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明确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式的论证方式,这一方式超越了政治经济学。针对空间的这一方法,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同时也是符号学的。那时我就决定评价这一新的城市分析,并讨论由列斐伏尔提出的这一问题。这本书是这些成就的集大成者,而且非常高兴能在八年之后为这新的一版写序。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意图更多是想做一个文献调查。有大量实质性的领域得到了讨论,包括寻找一种城市研究的统一方法,聚焦于新形式的聚落空间、关于大都会政治经济的社会空间方法、资本的二次循环的重要性、新城市运动中空间和地域的作用,以及社区关系中的一种批评理论。差不多十年之后,回顾并评价这些领域的重要性,是很有意思的。

城市研究的统一与分裂

在本书中,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史,城市社会学或主流的社会学方法已经得到了讨论。当我深思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城市领域种类繁多的著作时,感触最深的是其基于系统概念的统一观点。城市社会学受到依据有机体论的隐喻表述这一保守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局限既忽视

了阶级结构,也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其他城市领域没有这样依赖于有机体论,而且,无论是作为单一的大都会区域的城市领域,还是作为在国家或全球设置中的城市系统,对系统方法它们都给予了一致的关注,但它们忽视了阶级、资本主义和政治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它们也是意识形态上的。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我拒绝了城市社会学的方法,尽管我仍然欣赏它希望从区位和内在动态两方面来分析城市现象。此外,对我来说,城市领域——除了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地理学这些分类的学科——有很多共同性,这一点似乎很清晰。我所认为的新的城市方法可能会跟随主流著述和围绕共同观点的统一模式,一种可能基于空间、文化、民族、新的城市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的研究。除了范式变化之外,还有城市科学的累积性项目可以推进,或者我是这么想的。

回顾这种想法(或者我应该说“希望”?),它是欠考虑的。我未能理解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与今天的城市学家们之间的差异。当今是一个学科竞争激烈和专业分化的时期。狭隘和新奇成了当代城市研究最明显的特征,而不是用对话来表达。为了保护学科的领地,每一个领域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并围绕自己特定的内容组织讨论。城市科学的累积性项目已经被抛弃了。

例如,在地理学中,援引一到两位最知名的地理学家就足以展开任何城市话题的讨论(如“为城市政治学找到一个位置”),同时忽略其他领域的学者,如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大量的文献研究。在城市社会学中,讨论到发展的时候,只要提到“增长机器”就可以了。这样看起来似乎既不需要理解城市经济学方法更多的复杂性,也不需要更多的启示。最后,在政治科学方面,关于地方政府对新城市社会学的本质不够重视的无休止的争论,可能贯穿了互相对立的概念。因此,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反常的事物——为了保持(也有可能是改变)一种批判性的城市发展理论,这一讨论范围跨越了学科的界线。

新空间形式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不仅把这一问题与主流城市研究的局限性结合起来,也与学科的分析对象结合起来。事实上,所有的城市学者都优先考虑了大型的、主要的城市。而且,从我自己早期的研究开始,我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我称之为“多核大都会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绝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郊区,而不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大都会生活在蔓延地区的出现形成了很多居住、工业、服务和商业中心。多核大都会地区不仅包括了大型城市,还有围绕大城市不断扩展的小型中心。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以区域大都会空间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为基础。

这本书,依据去中心化概念化了新空间形式的动态化发展,这不仅指贯穿大都会区域的人和行为的去中心化,也涉及这些人和行为在新空间里的再中心化,甚至涉及革新后的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出现。我使用这一概念,因为它是一个单一的术语,指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聚落空间的重组,社会空间变化的整体概貌。去中心化突出了人口的两次转移——从城市到郊区(或者说是郊区化);从东北、中西部到西部和南部(例,从霜冻地带到阳光地带)。这一转移,引起了每一地区和所有的大都会区域的种种变化,包括中心城区。

自1985年以来,新空间形式观察发展的重要性,已经通过大量的研究凸显出来,包括克林(Kling)、奥林(Olin)、波斯特(Poster)、加罗(Garreau)、夏普(Sharpe)和沃洛克(Warlock)这些人。尽管如此,按照很通行的说法,在大都会区域和那些大型的、中心城区之间某种变化的关系,被他们忽视了。他们也没能体现出新的空间形式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本书提供了社会空间重构的整体观点。我的看法是,多核大都会地区是晚期资本主义一种显著的社会空间形式。多核模型和去

中心化的进程是空间思考的主要因素,现在,它们变得非常重要。

社会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在对主流城市分析的批评中,我认为这些分析强调了需求方面的贡献或者发展阐释方面的市场因素。相反,新的城市方法认可供给方面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引导并塑造了增长模式,并且常常在精英的偏好中得以证明。大都会发展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是基于供给方面行动的势力。有三种引导因素非常重要: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划;房地产业;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

如,主流倾向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见 Harvey, 1986)忽略了国家干预的作用,尤其是政府规划和拨款(如对郊区化的巨额拨款),这种行为鼓励并迫使它朝着某一方向发展。近年来,有更多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国家干预的作用上了,甚至主流倾向也已经承认供给方面的重要性(Frisbie and Kasarda, 1988; Feagin, 1988)。

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二个重要引导因素是房地产业。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殊方面已经说过很多了,但这里,在讨论它之前,一些意见有必要被归为第三种供给方面的因素:有关聚落空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结果。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都会区域受到了经济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重组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经常被概念化为:或者是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力分配”(Frobel, Heinrichs, and Kreye, 1980),一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所谓的“弹性积累”(Leborgne and Lipietz, 1987; Scott, 1988; Harvey, 1989);或者是对大规模“全球城市”关注的一种新的时代错误(Sassen, 1991)。很多这类著作大量借用了世界体系理论概念上的方法(作为一种批评,见 Milios, 1989; Busch, 1989; Gottdiener, 1989, 1990)。

诚然,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不断扩张的动态,成为当前大都会变化一种主要的供给方面的因素,对这一因素的悉心关注对城市空间上的处理非常重要。但是,如最近一些人认为这一因素是大都会区域重组的主要原因,这是完全错误的(见 Smith and Feagin, 1987; Sassen, 1991)。事实上,正如这本书明确证实的,在美国,主要的城市空间上的变化已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先期发生了,而且涉及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并伴随着去工业化的房地产业,这是世界范围内先进工业社会重组的一部分(见 Gottdiener, 1989)。而且,在近期的文章里(1990),我提出,更充分地认识当前的重组对转移到一种“弹性积累新体制”的关注较少,而更多地关注了资本主义不断的调整,在国家的大力协助下,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资产阶级发展中开始出现的棘手的危机。

资本的二次循环

列斐伏尔认为(1972),针对城市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实际上,这一贡献主要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1973)。恩格斯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租金、利润、价值、资本有机构成,等等——可以应用于城市的动态分析。这些概念属于社会范畴,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城市内部部署的生产资料,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特殊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得以持续。

城市的这一景象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景象。由于部署在工厂内部的这一显著形式,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关系。恩格斯论述了 19 世纪工业化城市这一突出形式的消费和生产的扩展状况,包括住房和社区生活的问题。

对于大都会的动态学,新城市分析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然而,列斐伏尔(1991a)极富启发性地提出,这种动态学不能独立反映工业化生产的逻辑。更确切地说,不能反映经济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主要的

组成部分是制造业、商业银行、零售业以及类似的东西；第二大组成部分是房地产业——它自己的银行和金融渠道、房地产代理、自有资产和市场。对列斐伏尔来说，资本的二次循环处于大都会环境变化的前沿，其必然原因是来自初级生产的逻辑中相对的自主性。其结果是，资本的二次循环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加深并恶化了第一次循环的危机周期。

列斐伏尔的想法十分大胆。在新一批地理学家中，只有戴维·哈维从列斐伏尔的著作中有效地概念化了一种城市政治经济学。但是，列斐伏尔的研究之后留下了很多概念上的问题。如果资本的二次循环确实具备相对的自主性，那么，阐明房地产或空间是生产的一种压力是很有必要的(Cohen, 1978; Gottdiener, 1987)。此外，基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房地产的作用必须加以明确。有必要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房地产能吸引投资(见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它如何与第一次循环中的投资周期联系起来。

最后，必须达成一种谅解，能够解决作为地点的土地开发和作为一种合理资源的土地开发，这才是大都会生活的实质，而不是作为一种农业生产上的资源。这意味着包括“地租”“虚拟资本”以及“专制和垄断”这些正在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回归的范畴——它表明 19 世纪的世界有一个单独的食利阶层——不如社会中持续管理着城市土地的利润、利息、抵押资产的净值、税收以及成本等范畴有用。这本书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和列斐伏尔一样，完善了恩格斯主义，尤其是它引出了从增长机器角度观察的某种谬误这一严重问题，它认为在美国存在着食利阶层。

自 1985 年以来，看到有多少“新”城市学家通过专门聚焦于动态的生产，或通过全面回避讨论空间剩余产品的社会分配及其政治学，而忽视了列斐伏尔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是很令人沮丧的(参见下面的总结讨论)。我们用经济主义来取代多维分析。

社会和领土争端

根据马克思主义所说,历史的关系就是阶级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废除了,而是通过空间的占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空间关系就是社会关系。正如这本书所揭示的,由于这些观念的引进,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资产阶级竞争的发生不仅贯穿在公司和利润之间、为了赢得市场的零售商之间、为了获得更高薪水的工人之间的斗争,这种竞争还贯穿了整个地方和自有资产。

通过资本二次循环的参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房地产是在商品资本主义制度内获取财富的一种独立资源。由于政治上的利益,住房所有者成了径直打通阶级界线的一个基础。产业化的房地产投机者和所有者变成了资本独立的小集团。对国家和国际政治复杂性理解的提升,源于领土争端的结果。最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不再在工业城镇内出现,而是通过一种国际化的劳动力分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有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被这些新的观念和寓意吓倒了(Katznelson, 1991)。正统的观点必须得到支持——一种使用非阶级社会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争论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抛在了一边,大都会生活中住房所有者的政治力量、在房地产和第一次循环之间资产阶级内部派系间的冲突、性别空间的意义(Spain, 1992),以及领悟斗争中领土的重要性,都是经验事实(Gottdiener and Neiman, 1981; Feagin, 1988),也是社会空间分析和空间批判理论的重要领域。正如列斐伏尔所提出的,这一问题不是关于放弃马克思主义,恰恰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完善。

一种社区关系的批判性理论

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观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关于日常生活的

概念(Lefebvre, 1991a, 1991b)。我试图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把这两种开创性的思想联系起来。自本书首次出版后,对这类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提升,由于日常生活是否取决于空间生产仍然是未知数,据说很多书中的“空间”及其重要性被忽视了。

通过一些空间社会学家对增长机器简化方法的运用,作为资本主义生活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冲突,以及这一社区生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得到了描述。这些观点来自列斐伏尔,但他用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运用了这一术语。使用价值源于列斐伏尔所说的“社会空间”,或者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交换价值源于同一社会空间。市场不是日常生活的大敌,它只是促成了日常生活的某种形式或风格。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分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二分法,这种区分忽略了国家和资本家双方可能使用空间的方式。

根据列斐伏尔的理论,与社会空间相对的是“抽象空间”。因此,这里有二维的、工具性的空间规划、国家干预和资本剥削的意思。当空间和它所表现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抽象概念和操作对象,并承担了它的转移形式。抽象空间是一种与工具主义的人类行为相联系的结构,它可以通过国家以及资本的干预得到充分的利用。

每一种干预为了获得成功,在服务于社会解放时都必须产生它自己的空间。改善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空间的社会生产承担一种物质形式。这是俄国革命失败给我们上的伟大的一课——当 20 世纪 30 年代俄国的构成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城市的规划者们纷纷入狱或被处决的时候,这一课已经十分清晰了。没有一个有助于社会生活的空间,社区关系不可能顺利发展并健康成长。空间的社会生产力并没有要求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形式;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社区理论,它为常见的一种重要理论做了补充。

空间成为一种重要的概念,是因为建成环境,包括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对日常生活的变化来说至关重要,而不是因为它允诺了某些新的生

活形式,如“后现代主义”之类。现代主义设计认可物理主义谬论——换句话说,它依赖一种信念,认为生活和工作的部署能够很轻易地通过建筑实践来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社会空间生产的概念不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排斥了建筑学的物理主义的谬误,相反的是,它认为非剥削的并有助于个人成长的生活和工作部署肯定可以通过社会的和空间的手段获得。没有其他部分的一维的社会变化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的逐步改变也需要空间的生产。

近来一些学者引入了一个“后现代地理学”的概念,这一新的观点对社会关系中的空间作用做出了正确评价。在我看来,经历了百余年,在“后现代”领域并没有找到它合适的分析对象,只有灾难。如果不涉及空间,地理学是关于什么?在后文中不只是谈论一些抽象概念、所谓“空间”的理想范畴,也不是他们所讨论的为了或反映政治经济学简单容器的一种建成环境。针对所有的城市研究,他们阐明了为什么空间是重要的,以及社会空间关系的思考何以能够证实我们对大都会发展的认识。正如我在下文中所阐释的,空间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既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符号学的。它具有一种双重的特征,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者。总之,正如这本书以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方式所提出的,空间的思考一直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一部分。

我要感谢这本书的读者在过去的八年发现了它的用途;我还要感谢学术界的朋友们对我的支持;他们是:Joe Feagin, Nestor Rodriguze, Ray Hutchison, Eric Monkkonen, Leonard Wallock, David Diaz, Bob Parker, Jens Tonboe, Lena Lavinias, Sueli Schiffer, Chris Pickvance, Margit Mayer, Phil Gunn, and Dorel Abraham.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书也在其他国家有了读者,虽然它主要是关于美国的状况。我还要特别感谢圣保罗大学的 Sandra Lencioni 审查了葡萄牙语的版本。

马克·戈特迪纳